

元

都市中的游牧民

史卫民 著

代

城

市

生

活

长

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K247

7

2006

都市中的游牧民

元

湖南人民出版社
史卫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 / 史卫民著. — 2 版.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5438-1313-0

I. 都... II. 史... III. 城市史 - 中国 - 元代 IV. K247.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9273 号

都市中的游牧民——



代城市生活长卷

出版人：李建国

总策划：廖铁

著者：史卫民

设计总监：虢剑

责任编辑：穆陵宁

装帧设计：



曾遥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410005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沙健峰彩印实业有限公司

印 次：2006年5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 × 970 1/16 印张：16.25

字 数：252,000

印 数：1-8000

书 号：ISBN 7-5438-1313-0/K.255

定 价：29.80 元

总序

季羨林

有一个事实，本来是彰明昭著的，却几乎为所有的中外人士所忽略（黑格尔似乎谈到过），这就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最爱历史，历史典籍的时间最久，最完整，最有系统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从蒙昧的远古轩辕黄帝开始，一代接一代，历数千年，一直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历史典籍从没间断过。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算是一部通史。从班固以后就有了断代史。而且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百废待举的丛杂混乱中，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前一个朝代修史。这就是所谓“正史”。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杂史”、“野史”等等名堂，以致在《四库全书》中竟形成了“史”这一“库”。

我们不能说，上面提到的史籍都是完全可靠的，都是实事求是的。那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信史”。中国史籍何独不然？一个推翻别的朝代的新朝代，为被推翻者修史，哪里能全讲真话呢？陆游诗：“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有人称史籍为“相斫书”或“断烂朝报”，似乎又贬得有点过了头。总之，我觉得，同别一些古国，比如印度，比较起来，中国史籍还是比较可靠的，其中神话和谎话，还不算太多的。

史籍多而全，有什么好处呢？换句话说，历史有什么用处呢？

用处是很多的，意义是很大的。我们常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又说“鉴古知今，鉴往知来”。类似的说法还多得很。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写了一部通史，命名为《资治通鉴》，所谓“资治”就是“有助于统治或治理”，用意昭然。历史还有“求真”的作用。历史事实是什么样子，我们就说它是什么样子，不歪曲，不浮夸，不有意或无意地说谎。从事实中抽绎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从中可以看出人类前途的走向，从而指导我们的行动，坚定我们的信心，尽量避免走弯路，走错路；尽量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一直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最后走向人类大同之域。这样的意义还不够大吗？

但是，学习历史求得历史知识，却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我们且来“鉴古知今”一下。在过去，学习历史要分清层次的。专门

研究历史的专家（我想把研究生也包括在里面），必须读二十四或二十五史，再加上一些“杂史”和“野史”等等。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那么，六经也是必须读的了。至于古代一些著名的通史，当然也在必读之列。低于这个层次是一般高中等知识分子。如果他们能读《资治通鉴》和《纲鉴易知录》一类的书，就不错了。再下一个层次是一般识字不多或根本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大概对历史知识没有多大的兴趣，可他们的历史知识是并不少的。这大概主要归功于小说和戏剧等。一部《三国志演义》就能给人们不少的历史知识。中国人有几个不知道关老爷等“桃园三结义”的人物的呢？诸葛亮更是“大名垂宇宙”。一部《说岳》，又能告诉他们关于岳飞和秦桧的故事。《说唐》则讲的是唐代的故事。在中国，这类的书多得很。从这类的书中又产生了各地各种的戏剧。于是老百姓的历史知识就显然非常丰富了。至于这些知识可靠与否，那是不言而喻的。里面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东西，大量存在。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历史知识，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类小说，不但影响了老百姓，连文人学士也逃脱不掉。清初诗坛祭酒大诗人王渔洋就曾写过过落凤坡吊庞凤雏的诗，为时人所讥。

建国以后，文化事业有了进步。为一般读者所写作的历史书籍，日益增多。据我个人的看法，通过小说和戏剧来学习历史知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学习历史的方法和渠道大大地增加了。联想到我在上面讲过的历史的重要性，这个现象是十分值得欢迎的。

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独具慧眼，另辟蹊径，采用了一种新办法，达到供一般读者历史知识，特别是历代社会情况的目的。他们的办法是以每个朝代的首都和一些大城市为中心，描述城市中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等等各方面的情况，由小见大，由近及远，藉以达到了解当时社会前进、历史发展情况的目的。这部《长卷》把学术性和趣味性结合或者融合起来，不讲干巴巴的历史事实，而能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美的享受中，把握住历史的脉搏，获得历史知识。《长卷》的作者们不是写小说，而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进行叙述的。这比以前利用小说和戏剧来学习历史知识，要好得多多了。我为中国的读者们感到无比的欣慰。

这一套丛书即将出齐。我祝它成功。我相信，它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的。一个不懂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不会知道去爱国的。这就是我一贯的信念。

是为序。



目 录

首卷 / 1

游牧民领袖的城市蓝图 / 1

甲编 / 16

斡耳朵(宫帐)搬进城市 / 16

胡床、象辇、羊车 / 26

大都周遭十一门 / 36

草原城市与江南故都 / 49

“禁夜”制度种种 / 58



乙编 / 66

城市居民的识别记号：服饰 / 66

宫廷“诈马宴” / 85

一日三餐 / 94

黑马乳、阿剌乞、舍儿别 / 111

饮茶习俗 / 122

丙编 / 130

婚嫁“各依本俗” / 130

皇帝送往漠北安葬 / 145

节、孝等观念对蒙古人的影响 / 156

从简单的跪拜走向繁琐的宫廷大礼 / 164

丁编 / 179

悠悠四季歌 / 179

打球、射柳、竞走 / 194

都市奉献的艺术名作 / 203

戊编 / 214



皇帝避暑：两都大游行 / 214

来自江南的小皇帝 / 221

震动朝野的大都事变 / 230

蒙古王子不长寿 / 240

洒泪别都市 / 247

后记 / 252

重版后记 / 253





游牧民领袖的城市蓝图

习惯于逐水草而迁徙的蒙古人，走进了陌生的城市。城市的财富和生活方式吸引了新的统治者，他们先试着在草原上建起宫殿和高大的城墙，随即造出了一座闻名世界的大都城。

1

公元1206年初春，北方草原的斡难河畔，立起了九游大白旗。蒙古乞颜部人铁木真，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成为大蒙古国的第一代君主。

这是一个地道的游牧帝国。臣民既是战士，又是生产者，“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军制》）成吉思汗的气势宏大的宫帐“斡耳朵”，就是国家的统治中心所在。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不需要城市，甚至不需要太多固定的建筑。

成吉思汗无疑是当时最令人敬畏的军事统帅，他带领成千上万的勇猛骑兵，一次次闯入农耕地区。“灭国四十”！（《元史》卷1《太祖纪》）成吉思汗的军队，不仅在中原、西北、东北出没，而且远及中亚和欧洲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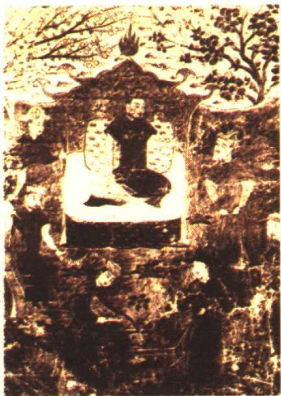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像



战争的破坏相当严重，城市首当其冲。“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牲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两朝纲目备要》卷4）“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狸啸聚其间。”（《墙东类稿》卷1）

最令人谈虎色变的，是蒙古军队的“屠城”。按照成吉思汗的规定，凡抵御蒙古军队进攻的城市，破城之后，除工匠、医师、卜士外，“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蒙鞑备录》）以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为例，城被攻陷后，蒙古军尽驱居民出城，先下令杀老者，“后二日，令再下，无老幼皆杀”（《静修先生文集》卷17）；“尸积数十万，磔首于城，殆与城等”（《陵川文集》卷35）。经过二十余年的战争



成吉思汗像

后，“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静修先生文集》卷16），西北地区和中亚等地的大小城镇，也先后遭难。

闯入农耕地区的蒙古骑兵，大多是秋来春去，对攻占的城市和地区弃而不守，因为他们游荡惯了，定居生活与他们格格不入。有人甚至发表了这样的高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城市真的对游牧的蒙古人毫无用处吗？

儒士、宗教人士和投靠蒙古人的各族将领，纷纷站出来说话了。

木华黎是成吉思汗指定的负责指挥对金朝作战的蒙古将领，号为“国王”。真定人史天倪率部众投附后，成为木华黎手下重要的汉人将领。他特别向木华黎说道：“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钞掠，非王者吊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为天下除暴，岂复效其所为乎？”史天倪的部下刘亨安也向木华黎建议：“自古建国，以民为本。今河东杀掠殆尽，异日我师复来，孰给转输？收存恤亡，此其时也。”木华黎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曾特别下令：“敢有剽虏者，以军法从事。”（《元史》卷147《史天倪传》，卷150《刘亨安传》）

北方道教教派全真道的长春真人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的邀请，远行数千里，赶到中亚去与成吉思汗会面。成吉思汗向他请教长生之道和治国之法，他的回答是要敬天爱民、清心寡欲，并且“每言欲一天下者，

元

代

城

市

生

活

長

卷

必在乎不嗜杀人”。(《元史》卷202《丘处机传》)

最起作用的建议来自契丹人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博览群书，尤长于天文、地理、律历、卜算，并曾当过金朝的官吏。成吉思汗看重耶律楚材的学问，任他为书记官。成吉思汗去世后，耶律楚材又得到大蒙古国第二代君主窝阔台汗的信任。他在窝阔台的同意下，派官吏从中原征收地税和商税等，人未离窝阔台左右，各地的粮食、金帛等已纷至沓来。窝阔台大为



成吉思汗骑马铜像矗立在成陵广场

高兴，对农耕地区的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蒙古人跨出草原南下后，金朝皇帝匆匆把都城从燕山脚下的中都(今北京市)移到黄河南岸的南京(今河南省开封市)。1234年，蒙古军队攻克南京，按照“凡攻城邑，敌以石矢相加者，即为抗命，既克，必杀之”的旧制，指挥作战的蒙古将领要求屠城。耶律楚材急忙去见窝阔台，向他痛陈利害：“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窝阔台犹豫不决，耶律楚材又指出：“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窝阔台终于接受了耶律楚材的忠告，下令禁止屠城，城中的147万人，因此而幸免于难。(《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

减少乃至停止屠城，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金朝和在河西地区立国的西夏灭亡之后，战场从黄河流域南移到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原乃至西北地区的城镇，在饱经战乱之后，慢慢地恢复着生机。

2

一个在中国北方勃然兴起的大帝国，没有一个固定的都城，这对习惯于定居生活和王朝统治的中原人士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不断向窝阔台汗提出建议，希望尽快建立都城。窝阔台经过反复考虑后，终于决定在漠北草原中心地带的斡耳寒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河畔建立都城。这样的选择在当时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这里是蒙古国的发祥地，被视为帝国统治的重心所在。新建的都城，被命名为哈刺和林城。



修建新城的工程始于1235年春季，工程负责人是汉人刘敏，他的职务是燕京工匠大总管。次年正月，哈刺和林内的主要建筑万安宫落成，窝阔台特别在这里大宴蒙古宗王，以示庆祝。1237年，窝阔台汗命令回回工匠在哈刺和林城北70里处修建扫邻城和迦坚茶寒殿。1238年，又在哈刺和林城南30里处建立了图苏湖城和迎驾殿。

草原都城的出现，确实是一件大事。游牧民的领袖蒙古大汗，终于认可了城市对国家的重要，并开始身体力行地去建造新城。

哈刺和林城市的建筑，一直延续到大蒙古国第四代君主蒙哥汗时期(1251—1259年)。

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就是后来的元世祖，早就“思大有为于天下”。他广泛接触“四方文学之士”，向他们请教治国方略。1251年，蒙哥汗命令忽必烈主持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带着一大群来自各民族的谋士来到漠南。为便于安置这些人，忽必烈在1254年派人修复了抚州城(今河北省张北县)，作为手下人员的临时住所。1256年春季，忽必烈命令僧人子聪选择合适地点兴筑新城，作为“幕府”的固定驻地。子聪相中了滦水北岸的龙冈为建城地点。龙冈北依南屏山，南临金朝皇帝的避暑胜地金莲川，东、西都是广阔的草原，地势平坦，宜于建城。这座新城，被命名为开平城，坐落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旗政府所在地黄旗大营子东北约20公里处。



元世祖像

开平城的建造用了三年时间，主持工程的藁城人董文炳、获鹿人贾居贞、丰州人谢仲温，都是汉人。

开平城的修建，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在民间留下了忽必烈向龙接地的传说。“相传刘太保(子聪)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成基。”(《至正直记》卷1)后来诗人杨允孚专门就此则传说写过一首诗：“圣祖初临建国城，风飞雷动蛰龙惊；月生沧海千山白，日出扶桑万国明。”(《滦京杂咏》卷上)龙的神话当然不足凭信，但从传说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修建开平城时，排干积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正是在设计者和工匠的共同努力下，漠南草原新城的建设得以顺利完成。

忽必烈非常重视开平城。1260年4月28日，忽必烈登上了大汗宝座，成为大蒙古国的第五任君主。隆重的登基大典，就是在开平城举行的。

3

作为一国君主，要控制人口众多的中原地区，原来的都城哈利和林城是离得太远了。一些蒙古贵族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忽必烈即位之前，木华黎的孙子霸突鲁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蹕之所，非燕不可。”（《元史》卷119《霸突鲁传》）尽管即位后忽必烈主要居住在开平城，并在开平城中修建宫殿，准备作为都城，但他还是很重视霸突鲁的意见，让臣僚们认真讨论都城的地点问题。

哈利和林显然已被排除在外。1260年冬季，忽必烈是在哈利和林度过的。他马上意识到，通过几千里的草原、戈壁把中原地区的粮食和各种物资运来，以保证庞大的中央机构、军队及迅速增长的都市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是很困难的事情。他同时认识到，大蒙古国的统治基础，已经在中原地区奠定，他要做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正统王朝的皇帝。如果继续在漠北建都，不把政治中心南移，仍会被人们视为偏在一隅的草原帝国，不但影响蒙古统治阶级的进一步联合，还会使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和管理难以走上正轨。无论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还是从政治形势方面考虑，哈利和林已经不适于作为都城。

供考虑的新的建都地点，实际上只有两处：一个是辽、金故都燕京城，一个是新建的开平城。

汉人谋士郝经的建议，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他认为燕京东面控扼辽东地区，西面与山西地区相连，背靠大山雄关，面对黄河以北的大平原，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正是皇帝统治天下的中心所在，理应在这里建立都城。那么开平怎么办呢？干脆设置两个都城，以燕京为正都，开平为陪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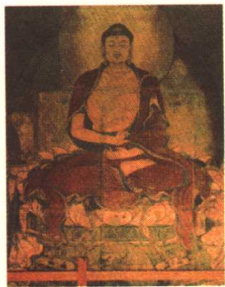
经过慎重的考虑，忽必烈同意设立两个都城。1263年6月16日，忽必烈下令将开平府改名为上都，后来人们又习惯地把它称为上京或滦京。1264年9月5日，燕京改名为中都；1272年3月4日，中都又改名为大都。在两个都城中，大都为正都，上都是陪都。



4

中都一大都的兴建工程以及上都的扩建工程，先后展开。

中都一大都城的设计，是在子聪的“经画指授”下，在儒士赵秉温等人参与下完成的。都城避开了原有的燕京城旧址，在它的东北重新规划都市的布局。这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历经千年的燕京城过于残破，尤其是原来的宫殿已经荡然无存，重新修理还不如新建来得省事；二是燕京城的水源主要依靠城西莲花池水系，不但水量不足，而且水质较差，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把城址移向东北，利用上接高粱河的琼华岛周围的湖泊，能够更好地解决城市用水问题。



元代佛像（山西兴化寺壁画）

中都一大都城的修建，分为几个步骤：

首先是重修位于今北京市内北海公园的琼华岛和广寒殿。工程从1264年春季开始，当年就建成了新殿；岛上的其他修复工程，则延续到1266年后。

随之建筑皇城、宫城和宫殿。工程始于1266年，1272年春季宫城完工，次年开始建造宫廷正殿大明殿，当年年底完工。1274年2月9日（至元十一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建成的大明殿内，接受皇太子、诸王和百官的朝贺，举行了隆重的“元正受朝仪式”。

最后是都城城墙及城内设施的建造，到1276年全部完工。

负责领导建造都城工程的，有汉人将领张柔、张弘略父子，行工部尚书段贞，蒙古人野速不花，女真人高觿，色目人也黑迭儿等。这些人中，段贞所起的作用最大，他不仅自始至终参加了大都城的修建工作，后来还长期担任大都留守职务，大都城建成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墙、宫殿、官署、河道的维修和增设，都是由他负责经营的。

1285年，官衙和居民迁入大都城的工作基本结束。

上都的扩建和改造，从1267年开始，持续了五六年，主要是建造上都宫城的主体建筑大安阁和孔子庙、城隍庙等，并补建了一批官廨。

忽必烈大兴土木，建筑都城，曾遭到来自蒙古族内部的非议。西北的蒙古宗王特别派来使者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

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元史》卷125《高智耀传》）这样的责问，并没有动摇忽必烈实行两都制度的决心。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

5

公元1271年，忽必烈将“大蒙古国”的国号改为“大元”。1276年，元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市）；1279年，在海上飘荡的南宋小朝廷被消灭。统一了全中国的元朝的疆域，“北越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元史》卷58《地理志一》），除了今天中国的疆土外，还包括今蒙古国全境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面积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疆土的两倍。

为有效管理如此广袤的国土，元朝统治者以行省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分天下为十一省，以山东西、河北之地为腹里，隶都省（中书省），余则行中书省治之”。（《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都邑》）先后设置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有以下10个：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省治辽阳（今属辽宁省），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汴梁（今河南开封），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奉元（今陕西西安），辖境包括今陕西省及内蒙古、甘肃部分地区。

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成都，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陕西、湖南部分地区。

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省治甘州（今甘肃张掖），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云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中庆（今云南昆明），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和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的一些地方。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省治杭州，辖境包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和江



苏南部地区，以及江西部分地区。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龙兴(今江西南昌)，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 and 广东省。

湖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鄂州(今湖北武汉)，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大部分地区及湖北省南部地区。

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省治和林(后改名和宁，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得尼召北)，辖境包括今蒙古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

除了上述11个行政区划外，元朝还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包括今西藏自治区全境及四川、青海部分地区的“吐蕃地区”(藏族聚居地)，作为与行省平级的行政区划。

在行省之下，设立路、府、州、县等行政管理机构。

1266年，忽必烈下令把北方的州分为上、中、下三等，15000户之上的为上州，6000户之上为中州，6000户以下者为下州。县也划为上、中、下三等，6000户以上为上县，2000户以上为中县，不到2000户的为下县。1283年，又对江南地区州、县的等级做出了规定，以5万户之上者为上州，3万户之上者为中州，不到3万户的为下州；3万户以上为上县，1万户以上为中县，1万户以下为下县。1295年对上、中、下州的户数做了一点修正，以5万户以下的为下州，5万至10万者为中州，10万户以上的为上州。

路的等级也是在1283年确定的。路分为上、下两等，“定十万户之上者为上路，十万户之下者为下路。当冲要者，虽不及十万户亦为上路”。(《元史》卷91《百官志七》)

根据1293年的统计，全国设置169路，43府，398个州，1165个县。(《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后来又有一些增减，所以在《元史·地理志》中登录的是“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军四，安抚司十五，县一千一百二十七”。

在行政管理方面，城市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一般情况下，行省机构的所在地选择大城市，至少是中等城市；路的治所，大多是中等城市；州、县的官衙，多数在小城镇，少数在中等城市。

城市人口和市区占地面积，是划分大、中、小城市的重要依据。

1291年，中书省户部统计的全国户口数字为：“内郡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八百七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万八千九百六十四，游食者四十二万九千一百一十八。”（《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根据《元史·地理志》记载的各路户口数字，可看出当时全国4/5的人口集中在江南的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余下的近1/5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中原地区，陕川、辽东等地人口稀少，这是元代人口分布的总的格局。

城镇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于资料缺乏，已经无从统计。我们只能列出一些与重要城市相关的人口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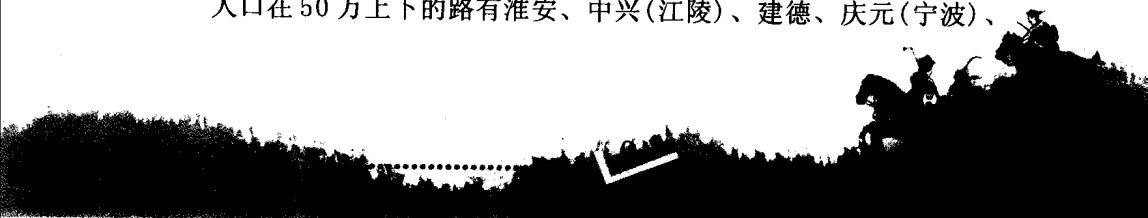
大都路的户口统计数字为147590户，401350人。人们通常用“都城十万家”来描述首都居民（王恽《日蚀诗》，《秋涧集》卷8），常住人口以每家4~5人计算，应为40~50万人。

上都路的户口统计数字为41062户，118191人，其中应有一半人住在城区内，其他人则住在上都路属下的州、县中。

北方、西北乃至四川，除大都以外，重要城市所在路人口超过20万人的，只有奉元（西安，27万）、巩昌（陇西，36万）、成都（21万）三路。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路有保定、真定、顺德（邢台）、大名、怀庆、卫辉、东昌、曹州、德州、益都、济南、大同、冀宁（太原）、晋宁（临汾）、汴梁（开封）等，人口将近10万人的，有重庆、延安等路。

江南地区和淮河流域人口密集，城市人口相对集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路有杭州（183万）、嘉兴（223万）、扬州（147万）、常州（102万）、婺州（金华，107万）、台州（临海，100万）、宁国（宣城，116万）、集庆（南京，107万）、饶州（波阳，403万）、福州（387万）、隆兴（南昌，148万）、吉安（222万）、袁州（宜春，100万）、抚州（109万）、常德（102万）、澧州（澧县，111万）、天临（长沙，108万）、静江（桂林，135万）、广州（102万）等。

人口在50万上下的路有淮安、中兴（江陵）、建德、庆元（宁波）、



绍兴、衢州(衢县)、温州、处州(丽水)、徽州(歙县)、信州(上饶)、建宁(建瓯)、泉州、瑞州(高安)、临江(清江)、工州(九江)、潮州(潮安)、武昌、岳州等。

30 万人上下的路有平江(苏州)、庐州(合肥)、安庆、湖州、赣州、衡州(衡阳)等。

北方能够容纳20万人以上的城市就算是大城市了,南方则要100万人以上的城市才能算作大城市。10万人以上的北方城市,就可视为中等城市,而南方则至少要在30万人以上才能算作中等城市。

城市占地面积也显示了这种差异。根据当时人的记载,大都“城方六十里”(《元史》卷58《地理志一》),与成都、平江的面积差不多(二城都是“方圆三十二公里”,见《马可·波罗游记》,第138、174页);杭州城则是“方圆一百六十公里”,几乎相当于大都的5倍。再如北方草原城市上都,城区方圆仅10里左右,哈刺和林城城区方圆约12里;而南方的绍兴城,城区方圆45里;镇江城城区方圆26里,都比上都等北方城市占地面积大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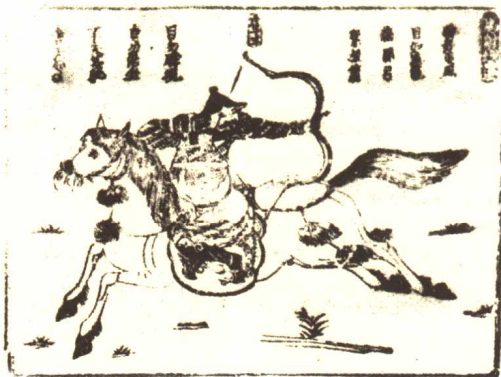
元朝时期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是对大都、上都城的修筑。其他城市的建设,则多为旧有城市设施的修复或重建,规模要小得多。各城市的基本设施,如城墙、街道、桥梁、园林及输水、行船设施等,一般比较齐全,但是多数城市的城墙、街道等年久失修,不像新建的大都城那样雄伟、整齐、壮丽。

7

城市中,居住着各种身份的人。

自从确定两都制度后,蒙古皇帝、皇太子和后妃改变了过去“居无定处”的生活方式,以城市为家了,只是前往上都巡幸时或进行大规模游猎时,才在“纳钵”或临时搭建的帐幕中暂住。

蒙古宗王和他们的家人,或者在大都、上都有固定的住宅,或者在分给他们的中原、江南“封地”的城市中建立“王府”,或者在草原“封地”中建



元人马射图